

# 从“多声部对话”看巴赫金的跨学科探索

## “Polyphonic Dialogue” in Bakhtin’s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

周启超 (Zhou Qichao)

**内容摘要:** 在不同的学科间自由穿行, 可谓现代斯拉夫文论大家十分突出的一种学术风范。在跨学科探索中生成的“多声部对话”这一思想, 凝聚着巴赫金的学术理念, 蕴含着巴赫金的理论旨趣, 堪称巴赫金理论学说的一个核心话语。“多声部对话”这一理论, 基于文学研究, 其辐射力已超越文学研究, 对于语言学、哲学、美学、伦理学等诸多人文学科都具有方法论意义。进入“多声部对话”这一核心话语生成机制与建构功能的系统梳理与深度解析, 可以看到: 这种对话是超语言学界面上的对话, 是具有伦理导向性的对话, 是具有文化哲学品格的对话; 这种“多声部对话”拥有在文学文本与文化现实之间自由穿越的阐释力, 是人文科学独特的认知路径。这种对话论是巴赫金潜心于跨学科探索的思想结晶。

**关键词:** 跨学科; 巴赫金; 现代斯拉夫文论; 核心话语; 多声部对话; 人文科学认知路径

**作者简介:** 周启超,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多年从事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斯拉夫文论经典汉译与大家名说研究”【项目批号: 17ZDA282】阶段性成果。

**Title:** “Polyphonic Dialogue” in Bakhtin’s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

**Abstract:** Traveling freely among diverse disciplines is typical of paradigm of Slavic literary critics. “Polyphonic dialogue” formed in the transdisciplinary exploration embodies Bakhtin’s thoughts and can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keywords in his studies. Though derived from Bakhtin’s literary studies, “polyphonic dialogue” goes far beyond literary studies and bears a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such humanities as linguistics, philosophy, aesthetics and ethics.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and systematic combing of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and constructive function of “polyphonic dialogue”, we can infer that such dialogue is translinguistic dialogue possessing the ethic orientation and has demonstrated properties of cultural philosophical dialogue. The “polyphonic dialogue” has the capacity of traveling freely between literary texts and cultural

realities and is a unique cognitive approach to humanities, which crystallizes Bakhtin's transdisciplinary exploration.

**Key words:** transdisciplinary; Bakhtin; modern Slavic literary theories; key discourse; polyphonic dialogue; cognitive approach to humanities

**Author:** Zhou Qichao,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Humanities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the studies of foreig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zhouqichao88@126.com).

在不同的学科间自由穿行，可谓现代斯拉夫文论大家共有的学术风范。雅各布森、英加登、穆卡若夫斯基、洛特曼、巴赫金这些大学者身上都富有一种跨学科能量。国际学界对巴赫金理论遗产的几度开采已经证实，巴赫金善于在语言学、文学学、符号学、阐释学、伦理学、文化学、美学、哲学这些不同学科间穿行，其建树可谓博大精深。这博大在于巴赫金文论的核心命题具有丰厚内涵；这精深在于巴赫金文论的核心话语具有多重意指。

一如“文学性”之于雅各布森，“文学作品层次论与具体化”之于英加登，“作为符号性事实的艺术”之于穆卡若夫斯基，“派生模拟符号系统”之于洛特曼，“多声部对话”则是巴赫金对现代斯拉夫文论所贡献的一个核心话语。它深为巴赫金所钟爱，凝聚着巴赫金的学术理念，饱含着巴赫金的思想激情。

### (一)

“多声部对话”是“复调说”（полифония, polyphony）的核心语义。“多声部对话”思想孕生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多声部对话”理念生成于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诗学——叙述艺术——长篇小说话语“结构形式”的考察。192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问世后不久，卢纳察尔斯基就在《新世界》（第10期）上发表长篇书评，肯定巴赫金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比迄今以前的任何人都更加明晰地确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多声部性的重大意义，以及这一多声部性的作用。

19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修订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面世，轰动苏联学术界与文学界，引起广泛讨论。很快，格·弗里德连捷尔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专家也看中巴赫金将“多声部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内在形式与审美特质联系在一起，而强调这正是该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1985年，对俄苏文论十分熟悉的法国文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称赞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之“多声部性”特征的把握是一大发现（托多罗夫85-86）。1987年，我国著名文论家钱中文看出，主人公自我意识的强调，横截面式的艺术描写，复调性对话的纷繁形式，形成了复调小说真正的独特性，是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最精彩、最有价值之处（钱中文14）。

中外学者们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虽有保留或争议，但对这一理论的核心，即复调式小说世界的“多声部性”，复调式叙事结构的“对话性”，复调式艺术思维的反“独白主义”精神，几乎是异口同声地予以首肯。

为什么说“多声部对话”是“复调小说理论”的核心语义？

这要从如何理解巴赫金视域中的“复调”谈起。巴赫金文论话语中，“复调”首先是一个隐喻，是巴赫金从音乐理论中征用到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术语。正是作为隐喻，被征用的“复调”这一术语的意义涵纳，在巴赫金的著述中上经历了从“小说话语结构”到“艺术思维范式”直至“文化哲学理念”这样一种“垂向变奏”，一种滚雪球式的扩展与绵延。在“复调”的诸多所指构成的一环套一环的“意义链”上，“小说体裁”这一环是巴赫金“复调说”的原点。巴赫金先用“复调”来建构他的小说体裁理论，用它来指称长篇小说的一种类型，具体说，就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巴赫金是在将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看成一位语言艺术家，而对其叙事艺术形式加以深入阐释这一过程中，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复调型长篇小说”首创者，进而提出其新人耳目的“复调小说理论”。“复调小说理论”的基本要点是什么呢？我们且听听巴赫金本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的解读。

巴赫金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个性时，几乎总是忘不了要使用“复调”这一隐喻来阐述“复调性”。巴赫金在他的两部专著，或者说，一部书的两个版本，即1929年问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与1963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里，阐述过“复调”；巴赫金在他的一篇提纲，即《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1961）与两篇札记，即写于1959—1961年间的《语言学、语文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中的文本问题》和《1970年—1971年笔记》里阐述过“复调”。在其晚年接受波兰学者兹·波德古热茨的访谈时，巴赫金还专门发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复调性”的解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一书成稿于1922年，其写作当起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百年诞辰之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的解读，对“复调性”的解说，实际上贯穿巴赫金长达半个世纪的整个学术生涯。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里，巴赫金指出：

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之众多，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性。

恰恰是将那些拥有各自世界、彼此平等的众多意识，在这里组合成某种事件的整一，而相互间并不发生融合。

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

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

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同度齐唱的）主调音乐】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如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从原则上便超越了某一人意志的范围。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就在于将众多意志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巴赫金 4、27）

在波兰学者 1971 年的采访中，巴赫金仍然坚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多声部复调型长篇小说的首创者。这种小说是作为终极问题之紧张而热烈的对话而被建构起来的。作者并不去完成这种对话，并不去做出其作者的解决；他是在揭示那存在于矛盾之中、存在于未完成的生成之中的人类思想。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的解读，在巴赫金笔下简直转换成一种音乐评论。巴赫金甚至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与巴赫的赋格曲相类比：每一情节性旋律同其他旋律的关系都是相对独立的：各自都在自由而独立地展开自己。巴赫金还引入“对位”这一术语，来论述“小说中声部的对位”。巴赫金何以如此热衷于征用音乐理论术语来隐喻其小说理论呢？巴赫金对这一“征用”有过解释：找不到更为合适的表述，小说艺术的建构在超越通常的“独白型”而出现的那些新课题，正类似于在音乐艺术中一旦走出单一声部的界面就会出现的那些新课题。“复调”与“对位”这样的艺术结构形象正可以对之进行隐喻。巴赫金似乎有意会通文学与音乐这两个异中有通的艺术门类，而来深入考量其共通的机制。巴赫金界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诗学基本特征时所用的基本语汇，与音乐理论家界说“复调”这一音乐形式时所用的基本语汇，构成了一种对应。在《音乐形式》这本教科书中，可以读到：

称之为复调或对位的，乃是这样的一种多声部，在那里诸声部都是各自独立的并以其自身意义而具有同等价值，诸声部在旋律上保持各自独立地展开之同时，组合成一体。（斯波索宾·И. В. 293）

重要的是这两门艺术在形式与结构上的对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叙事艺术与复调音乐艺术是否真有这些对应？<sup>1</sup> 巴赫金的回答是肯定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恰似歌德的普罗米修斯，他创造出来的不是无声的奴隶（如宙斯的创造），而是自由的人；这自由的人能够同自己的创造者比肩而立，能够不同意创造者的意见，甚至反抗他的意见。（巴赫金 4）

换言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主体，或具有

1 国内最近有学者认为，巴赫金定义的“复调小说”与复调音乐有重大差异。参见：钱浩：“复调小说与复调音乐”，《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4期。

主体意识的个性，是独立自主而有自己声音的活生生的人。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在同时共存、相互作用的关联中观照世界。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欣赏音乐家格林卡关于“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对位的”这一思想，而倾心于在小说世界中艺术地表现“不同的声音各自不同地唱着同一个主题”这一有趣的现象：

在別人只看到一种或千篇一律事物的地方，他却能看到众多而且丰富多彩的事物。在每一种声音里，他能听出两个相互争论的声音；在每个现象上，他能感知存在着深刻的双重性和多种含义。（巴赫金 40-41）

以巴赫金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人物的主体意识世界是那么丰富多彩，人物的声音充满着矛盾两重性与内在对话性，其关联其结构，恰似一种多声部。巴赫金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多种形态的对话，无论是发生于不同人物的主体意识之间的公开对话，还是展开于某一人物主体意识内部的内心对话，抑或是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对话，最终都体现于小说话语的结构，落实于人物言语的“双声语”结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言语中，“明显占着优势的，是不同指向的双声语，尤其是形成内心对话关系的折射出来的他人言语，即暗辩体、带辩论色彩的自白体、隐蔽的对话体”（巴赫金 270-271）。

双声语，它既针对一般话语的言语对象，又针对别人的话语即他人言语而发。具有双重指向的双声语，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对话对位艺术植根于小说话语。可见，巴赫金是由人物的主体性来谈论其独立性，是由意识的流动性来谈论其多重性，是由话语的双向性来谈论其对话性，如此一层一层地论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在话语结构上同复调音乐的对应。

后来，巴赫金以更为明晰的语言重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复调小说。巴赫金强调，作为杰出的语言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三方面的艺术创新。其一是创作（确切地说是“再造”）出独立于自身之外的生命，他与这些生命处于平等的地位。其二是发现了如何描绘（确切地说是“再现”）自我发展的思想（与个性不可分割的思想）。思想成为描写对象。思想不是从体系方面（哲学体系、科学体系），而是从人间事件方面揭示出来。其三是发现了“在地位平等、价值相当的不同意识之间，对话性是它们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巴赫金 374）。这三种创新，是“复调”这一现象的不同侧面，均可以“复调性”来概括。

学界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提出质疑的主要理由是无法接受“作者与主人公平等对话”。用巴赫金的“审美外位性”理论，或许可以化解这些质疑。莫斯科大学美学教授叶莲娜·沃尔科娃（Е. Волкова）认为：

在长篇小说的不同类型中，作者的外位性可能会是一时稳定些，一时又不太稳定，而在某些情况下似乎又是有意识地被作者缩减到最小。譬如对于自己笔下那些核心的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在放弃视界剩余（超视），而与主人公进行平等的对话。但是，为了使这一对话得以发生，第一，必须先要拥有视界剩余，以便然后再放弃它。其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一放弃变为独特的艺术手法。由此在巴赫金笔下才有那经典的“似乎”。以巴赫金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视界剩余的运用宁可说还不是为了从外部完成“审美事件”。视界剩余能孕生爱、认同、宽恕、积极的理解、倾听。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样的视界剩余评价为开放的和真诚的。一方面，巴赫金将主人公的意识看成是被局限的，而将作者的意识看成是未完成的。另一方面，在对于长篇小说而言最富于成果的“复调型”的形式中，巴赫金将那些重要的主人公的意识诠释为“似乎”是与作者的意识平起平坐的。（叶莲娜·沃尔科娃 164）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Л.戈戈吉什维里（Л. Гоготишвили）在其对巴赫金晚年第3本笔记的梳理中发现：巴赫金在20世纪七十年代的笔记里还继续思考“复调”：这“复调”并不是这一或那一小说片断的局部性品质，而已成为新的体裁样式。这里的新颖之处，并不在于（像当年大多数人对巴赫金所作的理解那样）作者进入与主人公的对话，而是相反，在于对话在这里被选定为描写对象。为了去描写这对话，作者作为审美主体，作为作者著述之审美功能的责任载体，就应当走出这对话，而放弃所有直接的与间接的表示自己立场的形式。在第3种笔记里，复调理论已得到更准确的建构：在复调中作者立场之观念性的、体裁上的条件一并不是恰恰以作者身份出场的作者与主人公们的对话，而是作者从对话中走出来（“自我消除”，“虚我”）自觉地放弃所有的自身话语样式（周启超 242）。

## （二）

善于在不同学科界面自由穿行的巴赫金，给“复调”这个隐喻赋予了更多内涵。在巴赫金笔下，“复调”不仅仅是对一个小说家艺术个性的隐喻，也不仅仅是一种用来指称新的小说体裁的概念，它更是一种用来指称新的艺术思维类型的范畴。这新的小说体裁，新的思维类型，都是针对（同度齐唱的）主调音乐的“独白主义”而提出的。要全面理解巴赫金的“复调”之所指，有必要先关注其对立面“独白”，关注这样一对相反相成的范畴——“复调性”与“独白性”。

在巴赫金笔下，“复调性”的反义词是“独白性”。在《陀思妥耶夫斯

基创作问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这两本书里，“独白性”的同义词为“（同度齐唱的）主调音乐”。巴赫金对“独白性”的阐述，立足于他对长篇小说体裁发育史的检阅，立足于他对“独白型”长篇小说局限性的分析。巴赫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所有的小说，尤其是欧洲与俄国的长篇小说归结为“独白型”。在这种类型的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作者一人的意识，小说的艺术世界完全由作者一人的意志所主宰。在这种类型的小说中，可以清晰地听出主导性旋律，与之伴随的是均是对主调的附和与唱和。作者在这里以“包罗万象和全知全能的视野”描写人物，人物完全受制于作者。作品中即便有对话，这对话也完全被作者本人终结性的声音所取代。这类小说里，只有作者声音是独立的、具有充足价值的，人物声音只是屈从于作者。以巴赫金之见，这类小说便是“（同度齐唱的）主调音乐”式的“独白主义”小说，或“独白型”小说。

这种小说体裁的发育，与艺术思维方式上“独白性”的盛行密切相关。巴赫金认为，小说家的审美视界长期受制于单一调的思维模式。欧洲小说的盛行，起始于理性主义、启蒙主义成为时代精神的十七、十八世纪，起始于单一调思维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独白原则在现代能得到巩固，能渗入意识形态所有领域，得力于欧洲理性主义对单一和唯一的理性之崇拜；又特别得力于启蒙时代，欧洲小说的基本体裁就是在这个时代形成的。（巴赫金 106）

一旦那种对单一和唯一的理想之绝对的信任成为小说家的世界观，小说中出现的多种声音便都要受到作者独白主义声音的制约，都要聚拢于由作者独断独裁的“话语中心”。于是，作者在这里犹如《旧约》中的耶和华；人物在这里简直沦为可任意形塑的材料；作品在这里是以单个观念为轴心的统一体；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是“在作者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由“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的”“统一的客观世界”。这样的小说，就是巴赫金所说的“独白型”小说。其“独白性”，体现于作者之造物主般的塑造性格终结形象的艺术立场，体现于人物完全成为作者意识中的客体这一艺术功能。作者声音高度权威化，作者意志高度绝对化，人物主体性失落，人物向无生命之物降格，是“独白性”小说的基本表征。

“复调性”创作要突破的，正是作者与人物之间关系上的这种不平等格局；“复调性”创作要颠覆的，正是这种由作者意志独断独裁的“独白主义”取向。巴赫金对“复调性”的阐述，建立在与“独白型”小说相对的“复调型”小说特征上。这种小说中的人物不再是作者意识中的客体，而是“直抒己见的主体”：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不是一个客体形象，而是一种价值十足的议论，是纯粹的声音；我们不是看见这个主人公，而是听见他；（巴赫金 70）

陀思妥耶夫斯基构思中的主人公，是具有充分价值的言论载体，而不是默不作声的哑巴，不只是作者语言讲述的对象。（巴赫金 84）

作者的意识不把他人意识（即主人公们的意识）变成客体，并且不在他们背后给他们作出最后的定论。作者的意识感到在自己旁边或自己面前，存在着平等的他人意识，这些他人意识同作者意识一样，是没有终结，也不可能完成的……

他人意识不能作为客体、作为物来进行观察、分析、确定。同它们只能进行对话的交际。（巴赫金 90）

作者将人物本有的主体性还给人物，人物与作者一样具有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相对于“独白型”小说，人物的艺术功能在“复调型”小说中得到“提升”，作者在“独白型”小说中独断独裁的意志，则在这里受到“节制”。

作者把一切都纳入主人公的视野，把一切都投入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熔炉内；而作为作者观察和描绘对象的主人公自我意识，以纯粹的形式整个地留在作者的视野之中。（巴赫金 62）

在“复调型”小说中，人物及其生活、周围世界不再只是处于作者唯一的视点上，而是同时也成为“人物自身进行反射的客体”。经过这样对人物功能的“提升”与作者意志的“节制”，“复调型”小说中人物的意识便具有与作者意识并列的权利和平等的地位。人物意识与作者意识比肩并列的格局，正是突破“独白性”而形成“复调性”的条件。

“复调性”小说的主旨在于展现那些拥有各自世界、有着同等价值、具有平等地位的各种不同的独立意识。“复调型”小说所追求的是把人和人（作者和人物）、意识和意识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展示世界是许多具有活生生的思想感情的人在观察和活动的舞台，是众多个性鲜明的独立自主的声音在交流和争鸣的舞台。那么，在人物的意识与作者的意识一样都自成权威，因而作者的统一意识似乎无从谈起的新状态中，各具独立性的意识之间又如何交流？各具主体性的声音之间又如何争鸣？依巴赫金之见，这就是意识之间的“对位”，声部之间的“对话”。人物的意识与作者意识在同一平面相并列，实际上就为意识之间的“对位”提供了保障。“复调型”小说，也就是各具独立性的意识相并列，各具主体性的声部相争鸣的“对位”小说，“对话”小说。

在这种小说中，作者与人物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是“严格实行和贯彻始终的对话性”关系。人物不再是无声的客体，而是具有独立性、主体性，



因而也有创造性，有自己声音的自由人，有意志有能力与其创造者比肩而立互动共存的活生生的人。对人物而言，作者的干预降至最低限度。作者的位置在哪里？作者不是在笔下人物之上，像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那样；不是在笔下人物之下，像果戈理在《死魂灵》中那样；不是在笔下人物身旁，像萨克雷在《名利场》中那样；作者应放弃他那种君临万物之上、《旧约》中耶和华般的特权，而降身于由他创造的人物之中，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基督那样，以自己的沉默促使他人去行驶其自由。作者应占据那种巴赫金称为“外位性”的位置。正是这一位置，在保障着作者对人物的对话性艺术立场、对话性审美姿态。

作者意志的这种“节制”，并不意味着作者的消极甚至放弃自己的意志。“作者并非仅仅汇集他人的观点，而完全放弃自己的观点”，而是“在特定的方向上”“不同寻常地扩大、深化和重建”自己的意识，“好让它能涵纳具有同等权利的诸多他人意识”。作者不仅从内部，即从“自己眼中之我”，同时也从外部，即从他人的角度，“他人眼中之我”，进行双向地艺术思考，使人物不被物化。作者意识与人物意识都处于运动之中，不断建构之中，开放的对话之中，一样是未完结而在不断丰富的，未确定而有待充实的形象。“复调型”小说，正是内在于若干各自独立但彼此对立的意识或声部之对话关系中互动共生的统一体。“复调型”小说的艺术世界，就是“多样性的精神之间以艺术手法加以组织的共存共在和交流互动”。复调世界就是多声部对话的世界。

可见，巴赫金“复调性”的核心语义是“多声部对话性”。巴赫金的“复调性”，是与“独白性”针锋相对的“多声部对话性”之别称。“多声部对话”作为一种新的艺术思维方式，在全面地革新作者的艺术立场、人物的艺术功能与作品的结构范式。这种确认笔下人物也具有主体性而恪守“外位性”的作者立场，这种获得内在自由具有独立意识因而能与作者与其他人物展开“对话”的人物功能，这种以作者与人物、人物与人物这些不同主体之间不同声音的并列“对位”而建构的作品范式，充分体现了“多声部对话性”对“独白性”艺术思维方式的突破与超越。巴赫金推重这一突破与超越，甚至将之喻为“小规模哥白尼式的转折”。

当巴赫金将“多声部对话性”艺术思维对“独白性”艺术思维的突破，同哥白尼的“日心说”宇宙观对“地心说”宇宙观的突破相提并论时，“多声部对话”这个概念的所指便升级了：“多声部对话”不仅指称一种艺术思维方式，更是指称一种哲学理念乃至一种人文精神。“日心说”使地球移出其宇宙中心的“定位”，天文学家由此而得以进入宇宙复杂的交流互动实况的重新观察；“多声部性”使作者迁出其在作品世界话语中心的“定位”，文学家由此而得以进入对生活本相、对“内在于若干各自独立但彼此对立的意识或声音之对话关系中互动共生的统一体”作生动逼真的艺术描写：“多

声部对话”更可以引导思想家由此而得以进入对自我意识如何运作于文学世界以外的人际交往活动的重新理解，对主体间的交往机制乃至真理的建构机制、意义的生成机制等一系列关涉哲学、社会学、美学、伦理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文化学等重大命题的重新思考。“多声部对话性”作为一种哲学理念乃至一种人文精神，在人文科学中引发的变革，用“小规模哥白尼式的转折”来比喻，实不为过。尊重他人的主体性，确认交流中的多声部性，倡导彼此平等的对位对话与共存共生，这些“多声部对话性”之思想原子的能量，确实难以估量。

“多声部对话”作为哲学理念，其精髓乃是“不同主体间意识互动互识的对话”，其根源乃是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性。巴赫金从“多声部对话”出发，考察作为主体的人相互依存的方式，考察两个个体之间相互交往关系，进入他那独具一格的哲学人类学建构。他谈的是文学学问题，阐发的却是哲学思想。巴赫金的文学理论已然溢出其传统的界面。譬如说，“多声部对话性”艺术思维要求不同的意识保持对位状态，巴赫金便以此为思想原点，论述人的存在问题。当人物与作者平起平坐，人物的意识与作者的意识并列对位，就构成存在的事件，就形成一种交往。“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性的交往”，“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的文论也不仅仅向美学延伸，譬如说，他论述两个不同主体各自独立的意识“既不相融合也不相分割”，才构成审美事件；两种意识一旦重合，就会成为伦理事件；一个主体意识面对一个客体时，只能构成认识事件；当另一个意识是包容一切的上帝意识的时候，便出现了宗教事件。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理解巴赫金本人用来描述他一生的活动领域所用的并不是“文学理论”，而是“哲学人类学”。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理解虽然一生都以文学教学与研究为职业，巴赫金却要人家注意到他“不是文学学家”，而是“哲学家”。

巴赫金的文学理论，的确是以深厚的哲学思想为底蕴为支点。艺术思维方式上的“多声部对话性”，是建立在巴赫金关于真理的建构机制、意义的生成机制等伦理哲学与语言哲学之上的。巴赫金文论中的“多声部对话”，植根于他的伦理哲学的本体论。巴赫金认为，真理并不存在于那外在于主体的客体，也不存在于那失落了个性的思想。真理不在我手中，不在你手中，也不在我们之外，真理在我们之间。它是作为我们对话性的接触所释放的火花而诞生的。巴赫金甚至坚持，创作过程即主体间对话过程，意义只能在对话中产生。小说结构与艺术思维中的“复调性”，乃源于巴赫金的多声部对话哲学。对于多声部对话哲学，“复调说”只不过是它的一种应用。

巴赫金的“复调说”本身也是“多声部对话”的产物。“复调说”孕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巴赫金向苏联文学学界两大显学——偏执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内涵之“解译”的社会学文论与偏执于文学的语言艺术形态之“解析”的形式论文学学——的双向挑战。巴赫金看出弗里契、彼列韦尔泽夫及其弟子

们“一律以文学之外的要素来解释文学现象”的“可悲倾向”，看出了将拉斯柯尔尼科夫或伊万·卡拉马佐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完全等同的庸俗荒唐，看出什克洛夫斯基及其同道们执迷于艺术创作手法技巧的局限，看出将诗学束缚在语言学之中而陷入“材料美学”的危险。巴赫金批判地吸纳了社会学文论与形式论文学学的积极成果，主张“从文学内部去阐述文学的社会特性”，从话语内在的对话本质，从话语创作的对话品格切入文学研究。这一路径对于20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文学学两大范式的偏颇是一种有力的校正。

然而，巴赫金“复调说”所挑战的对象，远非局限于文学学。

“复调说”的核心语义，即“多声部对话性”，诸种声音“既不相融合也不可分割”，各自独立而又彼此相关，在对位对话中并存共生，是意蕴丰厚的隐喻，可以指涉人文学科诸多领域。在不同界面，“复调说”的思想能量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在小说体裁上，学界对“复调小说理论”仍有争议（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就是“复调型”小说的首创者，或者，“复调型”小说是否一定优于“独白型”小说而最终将它取代），那么，在艺术思维上、哲学理念上，甚或人文精神上的“多声部对话性”，在学界对巴赫金一次又一次的发现中则已然得到普遍肯定。历史的曲折表明，多讲一点“对话性”，少来一点“独白性”，对于保障文学理论建设乃至整个人文科学探索在健康的氛围中进行，十分必要。真正富有成效的学术“对话”的前提之一，就是具备了“多声部对话”意识，而追求“多声部对话”境界的不同主体。以“多声部对话性”为其核心语义的“复调性”这一隐喻，其内涵甚为丰厚，我们要悉心把握它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意涵。巴赫金本人也一再提醒，“不要忘记这一术语的隐喻性出身”（巴赫金31-32）。也正是这一隐喻性，滋生了“复调性”所指的丰富性。

### （三）

现在看来，之所以曾出现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质疑与批评，之所以还有对“作者与主人公平等对话”的困惑与不解，其中一个“堵点”也许就在于这些质疑者批评者没有将巴赫金“对话论”置于跨学科的视域，而进入“多声部对话”之独特内涵的深度解读。进入巴赫金的跨学科探索实践的梳理，进入“多声部对话”思想之生成机理的勘察，就会看到：巴赫金的“对话”是“超语言学”界面上的对话，是具有伦理导向性的对话，是具有文化哲学品格的对话，是开辟了整个人文科学独特认知路径的对话。惟其如此，这对话才拥有在文学文本与文化现实之间自由穿越的阐释力。俄罗斯、美国、英国、波兰等国巴赫金专家对“多声部对话”的最新解读，显示出国际斯拉夫学界对巴赫金“对话论”之跨学科基因的深耕。

俄罗斯著名巴赫金专家瓦列里·秋帕（В.И.Тюпа）最近撰文论述，巴赫金的“对话”指的是“对话关系”，它有别于“对话言语”。与独白和对话

这样的语言哲学范畴不同，巴赫金的“独白主义”和“对话主义”概念属于“超语言学”（*Бахтин* 321），“对话关系比对话言语更宽泛”（*Бахтин* 336）。“相应和”更准确地传达了巴赫金的理念。“相应和”是“最为重要的对话范畴”（*Бахтин* 364），是对话关系的最高形式。要想理解作为对话关系最高形式的“相应和”，就应深入理解巴赫金“对话主义”这一范畴的内涵。“对话主义比对话更宽泛”（*Бахтин* 361），它也包括独白在内<sup>1</sup>。“对话主义”是人与人之间真正属于人类的、具有人道主义特点的关系。人类的统一“不是作为天生单一存在的，而是不相融合的对方或几方达到的对话性相应和”（*Бахтин* 346）。“独白主义”掌握“终极话语”的专属权，忽略他者身上之人的特性，剥夺自己的话语对象——“人身上的人”之内在地位。独白者把他者排除在外，把他人变成自己思想之无声的客体（*Бахтин* 332）。“独白主义”是对真正人的相互关系的歪曲，是借助功能—角色形式对交往中个性的压制。在真正有活力的交往中“话语是不能赋予某一个说话人的。作者（说话人）对话语具有不可分割的权利，但自己的权利同时也是听话人的权利，作者的话语中所包含的声音之所有者也具有自己的权利”（*Бахтин* 332）。可是，在社会主体的官方—角色功能化过程中，“话语权”的重要性和完结性却是被严格规定的。

秋帕认为，具有伦理导向性（*Бахтин* 364）的“复调性的相应和”（*Бахтин* 302）是巴赫金的一个基本概念。（瓦列里·秋帕）相应和的对话之伦理导向性，对于深入理解巴赫金论拉伯雷那部书具有直接关系。相应和的对话作为对话关系中的一种形态，也有助于多维度地理解历史上与现实中的“狂欢化”功能。

质言之，巴赫金视域中的“对话”并不是“对话言语”，而是“对话关系”，是“多声部相应和的对话关系”，是“超语言学”意义上的对话，是“具有伦理导向性”的对话。

这种超语言学的、具有伦理导向性的“对话”，具有在文学文本与文化现实之间穿越的解释力，具备文化哲学品格。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这样的头衔尚不足以涵盖巴赫金这位思想家的真实体量。英国著名巴赫金专家加林·吉汉诺夫认为：巴赫金沉潜于其中的首先是文化哲学。作为思想家的巴赫金其领土位于诸学科之间。正是在这个空间里他创造出他专有的隐喻，那些隐喻使得他自由地游弋于不同学科，潜心于那些已然超越学科所确定的知识域极限的问题。巴赫金时常是不动声色但总是绝对具有激活性地提出一些范畴，超越它们所属学科之观念性的局限，赋予它们新的生命（Е.Добренко, Г.Тиханова М. 307）。

1 布罗伊特曼（С.Н. Бройтман）指出（戈戈季什维利 Л.А. Гоготишвили 也持此观点），对巴赫金来说，独白和对话不是体现为辩证的二元对立，而是“某种对话关系谱系”的两极。（Бройтман С.Н. Диалог и монолог (от «Проблем творчества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к поздним работам Бахтина) // Дискурс. 2003. № 11. С. 46–48).

吉汉诺夫指出，单单聚焦于语言学的源头不可能解释巴赫金“对话主义”的力量与吸引人之处。关注“对话”并不是巴赫金的专利。巴赫金使我们对于“对话”的理解焕然一新，邀请我们去听取每一个说出来的话语内部的对话；去听取在那些表达相反的世界图景的声音之中被呈现的对话；去听取那种已然成为广阔的文化类型学之基础的对话（Е.Добренко, Г.Тиханова М. 307）。吉汉诺夫十分推重巴赫金善于在各种见解的熔炉里提炼，善于在不同学科中穿越的能力。吉汉诺夫看出：巴赫金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独创性就在于一个伟大的综合者实际具有的独创性，这样的综合者自由地运用来自多种不同学科——语言学、艺术史、神学等等——专门化的话语之中的概念，然后予以改变并扩大这些概念相互作用的场域。巴赫金成功地完成了从其早期著述中的伦理学与美学走向成熟期著述中的文化哲学这一真正的演变（Е.Добренко, Г.Тиханова М. 308）。

作为在文化哲学园地耕耘的大学者，巴赫金的“对话论”还体现于他对人文科学独特认知对象、独特认知路径的深度思考。“对话论”的一个起点就是“对话”与“独白”的对立。这一对立缘起于巴赫金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

自然科学被巴赫金界定为独白型知识形态，人文科学则被界定为对话型知识形态。前者的独白性在于，“人以智力对物进行观察而表达对这个物的看法。这里仅仅有一个主体——在认知（在观察）而在言说（在表达的）主体。与之相对的仅仅是无声之物（Бахтин 363）。自然科学认知是典型的“主体—客体”关系，人文科学认知是典型的“主体—主体”。因而，人文科学作为认知者同被认知的主体之相遇，乃是对话型认知形态。（博古斯拉夫·祖尔科 231）

波兰著名巴赫金专家博古斯拉夫·祖尔科不久前对巴赫金运用“对话论”探讨人文科学认知路径的论述进行再检阅。祖尔科观察到，不同于狄尔泰，巴赫金是以另样的视界来看取人文科学的对象。根据狄尔泰的理论，人文科学的对象乃是在文化作品里被体现出来的“精神”。狄尔泰学说的基本范畴，诸如体验，表达，理解，均属于这一超个性的范围。在巴赫金这里，占据这一“精神”位置的，则是“有表达力而能言说的存在”（Бахтин М.М. 410）。

人文科学——研究人及其特性的科学，而不是研究无声之物与自然现象的科学。人带有其人为人的特性总是在表达自己（在言说），也就是在创建文本（即便是潜在的）（Бахтин М.М. 285）。文本之巨大的作用引人注目，文本成为所有的人文科学中第一性的现实。人文知识不是直接地同“精神”打交道：在历史学家、哲学家、语文学家与“精神”之间总是存在着文本，曾经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所创建出的文本。精神不可能作为物（自然科学之直

接的客体)而得以提供,只能以符号性的表达而得以提供,在为自己也为他人的文本中而得以实现(Бахтин М.М. 284)。

人文科学所研究的乃是人的精神之文本。因而巴赫金将人文科学称之为“语文科学”(Бахтин М.М. 363)。这一界定在补充性地强调话语、文本作为人文思维之根本的基础作用。

在对巴赫金有关人文科学是“对话型”知识形态的论述进行梳理之后,祖尔科进入巴赫金有关人文科学认知路径的探讨:根据狄尔泰的理论,“理解”是为人文科学所适应的方法。文化作品不可重复,它总要被赋予个性。文化乃是由清一色的特例而构成,任何“普遍性”规律都无法对它们加以“解释”。

在进行解释时——仅仅存在一个意识,一个主体:在进行理解时——则存在两个意识,两个主体。对客体不可能有对话关系,因而解释已失去对话元素(除了形式——修辞学上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具有对话性(Бахтин М. М. 289-290)。

既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对象也有自己独特的认知路径的人文科学,同自然科学之间是否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祖尔科将其梳理继续推进:有别于狄尔泰,巴赫金否定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存在着绝对不可逾越的界线。这里的问题也不仅仅在于一些量化的(数学的)方法对人文科学的入侵。

巴赫金认为,属于文化世界的任何现象,均可以在两个取向——物与个性,客体与主体——上来加以考量。仿佛存在着两个认知限度——物与个性。任何对象,其中也包括文本,均可以被置于这两个远景中的一个而得以研究。在这里重要的恰恰是,物与个性——这正是某种限度,某种极,而不是静止不动的立场。

一旦接近个性这一极,文本便在其中被人格化,便会听见个性的声音。一旦接近物这一极,文本便得以物体化,物化。第一种情形下,我们要做的事是以对话性态度看取文本,人文科学所致力也正在于此,第二种情形下,则是以独白性态度看取文本,把文本变成无声之物。(博古斯拉夫·祖尔科 232)

巴赫金对于这些视界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截然否定,只要它们守持住自己的界限。结构主义的“文本解剖学”,将文本物体化,其实是在延续实证主义的科学模型——这种“文本解剖学”,完全正当合理,只要它守持在自己的界限里,而并不去奢望成为对于事物之完满的、完整的认知。在这里,回想起巴赫金对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批评也是适宜的:形式论者的“材料美学”在一些局部性问题上,在话语创作的某些“技术性”层面的分析,是有理而正确的,但不可能成为整个文学作品理论,文学作品除了其之外在的物质,自身还包含着非物质性的审美客体。

祖尔科观察到巴赫金对人文科学之“准确性”的思考：

巴赫金还将在两个取向——物与个性——上考量文本的潜能同人文知识的准确性与深度这一问题关联起来。可以说，准确性乃是对文本进行描写——在其“材料的”、物的现实这一维度上进行描写——的目标。准确性要求的是物与其自身的吻合。准确性乃是为“实践上的把握”所需（Бахтин М. М. 410）。深度则是文本之涵义的、表达力的、“个性的”层面所具有的特征，而且对于人文科学而言它本身就是标记而有特别意义。（博古斯拉夫·祖尔科 232）

祖尔科看出：在文学批评、文学研究这样具体的人文科学话语实践里，准确性，一如在数学学科里人们对之理解的那种准确性，只是在对文本之“物的”方面进行描写时才有可能，且是适当的。文本的价值—涵义方面则不可能领受“准确的”描写，“因为它是不能被完结的，而且它也不会与其自身相吻合（它是自由的）”（Бахтин М.М. 410）。

巴赫金之“多声部对话”思想，基于文学研究，其辐射力已超越文学研究，对于语言学、哲学、美学、伦理学等诸多人文学科都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进入“多声部对话”这一核心话语的生成机理与建构功能的系统梳理与深度解析，可以看到，这对话具有跨学科的品格：这对话是超语言学界面上的对话，是具有伦理导向性的对话，是具有文化哲学品格的对话；这对话，拥有在文学文本与文化现实之间自由穿越的阐释力，是人文科学独特的认知路径。这种“对话论”，是巴赫金潜心于跨学科探索的一个思想结晶。

### Works Cited

- 卢纳察尔斯基：“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性’”，于永昌译，《外国文学评论》1(1987): 49-51。
- [Lunachasky, “On Dostoevsky’s ‘Polyphony.’” Trans. GAN Yongchang. *Foreign Literary Criticism* 1(1987): 49-51.]
- 弗里德连捷尔：“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若干新书”，《俄罗斯文学》2(1964):179-190。
- [Friedlinder, “Several Books on the Studies of Dostoevsky.” *Russian Literature* 2(1964):179-190.]
- 托多罗夫：《批评的批评》，王东亮 王晨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 [Todorov, *Criticism of Criticism*. Trans. Wang Dongliang & WANG Cheny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 钱中文：《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译本前言，第14页，/巴赫金 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 顾亚玲 译，三联书店，1988。
- [QIAN, Zhongwen. “Preface.”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Chinese Version)*. Trans. BAI

Chunren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巴赫金 著：《巴赫金全集》第5卷，钱中文主编，白春仁、顾亚铃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Bakht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Bakhtin*, Vol.5, Eds. QIAN Zhongwen et al., Trans. BAI Chunren et al.,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兹比格涅夫·波德古热茨：“对巴赫金的一次访谈”，《对话中的巴赫金：访谈与笔谈》，周启超译，王加兴 编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7-15 页。

[Zbigniew Podgórecki. “An Interview with Bakhtin.” Trans. Zhou Qichao. *Bakhtin in Dialogue: Interview and Essays*. Nanjing UP, 2014.7-15.]

斯波索宾 И.Б.: 《音乐形式》，莫斯科，1967。

[Sposobin. *Forms of Music*. Moscow, 1967.]

叶莲娜·沃尔科娃：“外位性与对话”，《俄罗斯学者论巴赫金》，萧净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159-168 页。

[Volkova, E. “Outsideness and Dialogue.” *Russian Scholars on Bakhtin*. Nanjing: Nanjing UP, 2014.]

周启超：《“巴赫金学”的一个新起点》，《社会科学战线》4 (2016): 238-242.

[Zhou, Qichao. “A New Start for ‘Bakhtin’s Studies.’” *Social Science Front*. 4(2016): 238-242.]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诗学诸问题》。基辅，1994 年。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Creative Poetics*. Kiev, 1994.]

Бахтин М.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7 т. М., 1996–2002. Т5.

[Bakhtin, M.M. *The Complete Works of Bakhtin*, 1996-2002, T5.]

瓦列里·秋帕：《相应和的对话》，刘锷译，（《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待发）

[Tsupa, V. “Echoing Dialogue.” Trans. LIU Kun.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o be published.]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советская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ая эпоха Под ред. Е.Добренко, Г.Тиханова М. НЛО, 2011.С.307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ry Criticism: Soviet and Post-Soviet Period* Eds. E. Dobrenko & K. Tihanova, M. HLO, 2011. ]

Бахтин М.М. 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 Москва: Искусство, 1979.

[Bakhtin. *Slovenia Creative Aesthetics*, Moscow: The Arts Press, 1979.]

博古斯拉夫·祖尔科：“巴赫金观点系统中的人文科学”，周启超译，《社会科学战线》4 (2016): 228-232.

[Zyerk, “Humanities in Bakhtin’s Conception System.” Trans. Zhou Qichao. *Social Science Front* 4 (2016): 228-232.]